

## 开拓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新境界 (代主持人语)

王春辉

如果仿用费尔南·布罗代尔对于“社会”的表述,可以说:语言是散漫而无所不在的实在,它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包围我们,向我们渗透,指导我们的全部生活,但有时候,我们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语言天然不是为了国家及其治理而产生,但是国家及其治理却天然需要语言这一关键要素。语言及其治理是国家及其治理的核心组件,推进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固有要求。

近几年,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渐成热点,从各级各类项目立项情况和各杂志的专题研究情况即可见一斑。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成为一个研究方向,有着现实和学理的双重基础。现实基础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中国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学理基础就是,传统“小学”、近代西学、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生活状况以及社会语言学等研究提供的学术基础和给养。

远的不说,如果从1892年卢懋章《一目了然初阶》的创制算起,近代以来的中国语言治理/语言规划已经走过了130个年头。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经历了偏向西化到寻求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历程。扫除文盲、汉语拼音化并最终定案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的整理和简化、确立和推广普通话、语言文字的标准化与信息化和法治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时代的语言治理等,构成了130年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主线。这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比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是前提,然后才是实事求是地做;语言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工程,是一个分阶段、试点化、稳步推进的体系,是一个需要充分调查、深入研究、反复会商的过程;语言治理需顺应历史潮流,因时而动,要问题导向,以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来带动科研和事业发展;语言治理的区域化、领域化和国际化有力推动着研究和事业发展;全国最顶尖的学者引领,各类学会、研讨会、培训班、学术刊物发挥着各自作用。语言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全民性特点,130年默默耕耘,为国家教育和科技的普及提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提升和国际交流的增强贡献了力量。

人类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迈入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演化、国家治理环境和路径的演进,将带来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的新景象。下面从4个维度简要举例说明。

研究观念。首先,治理是一个由时间和空间形成的交集,所以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范畴之下任何因素的变化,都会对治理的形式和内容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时间范畴,就是说治理是一个延续性或者说继承性的过程,古今线性延展、承继延绵;空间范畴,就是说治理是一个具体地理空间、内外空间互动的过程(尤其要注意国际对国家、其他地区对一个地区的影响)。所以,治理是一个涉及古今、涵盖内外的体系。前者强调古代治理对于当代治理的影响;后者强调治理的当地化以及内外之间的互动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其次,语言治理的研究与实践需要系统论思维或者历史合力论思维,从稳态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一方面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其他部分的变化,势必引起语言治理体系的变化;另一方面,语言治理内部也是一个稳态结构,也是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制衡与协调构成了一个耦合系统,而因素之间耦合的错位或断裂,即会带来治理体系的变迁。

研究视角。一是理论视角,未来亟须加强理论的提炼总结和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究,比如语言生活派理念和理论的凝练、语言治理学科构建、不同类型的文字体系在助力国家治理的功能和效能上有哪些异同等基础问题。二是关系视角,即在语言治理和国家治理过程中,语言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组合搭配的

方式和形态,语言治理与政治治理、安全治理等其他治理子体系的关系问题。三是分类视角,比如全球的区域国别语言治理和国内的区域语言治理,媒体、教育、窗口行业、政府部门、写作文风、青少年或老年、法律等各领域的语言治理。四是辩证视角,一方面是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需要保持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语言生活的敏感度,对于好的积极的现象要鼓励倡导,对于不好的消极的现象要辩证批判、力争改观;另一方面是对新观点或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的辩证选择。

研究论题。将古代、现代与未来相照应,将国内、区域与国际相统筹,进一步拓展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的研究方向和话题选题。比如中国古代语言治理整体和细化的研究,整体性研究有必要编纂中国语言治理史,细化性研究比如文字规范、翻译、语文启蒙课本、语音规范等的分类研究;语言和文字在人类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数字社会不同阶段介入国家治理的方式形态、深度广度、意义效果的研究;当代全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语言治理能给予哪些助力,比如粮食危机与饥荒、能源危机与经济周期、全球变暖与气候变迁、地区冲突与战争、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数字时代与人机共生、太空航天与宇宙探索等;不同时代语言传播的规律是怎样的,未来中文的国际教育和传播需要怎样的战略和战术;从分裂走向统一之后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政策;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什么,融媒体时代语言与真相有怎样的互动和协调,认知框架和话语权对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有着怎样的促动或限制;人机共生时代,人机语言共同进化的方向在哪里,现实和虚拟的融合对于语言治理提出了哪些新挑战。

研究方法。应当说当前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在方法层面是较为丰富的,比如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个案或区域)民族志、数据统计、归纳、比较、历史结构、话语分析、扎根理论、社会网络等都被应用到相关研究。但是一方面,使用这些方法的科学性有待提升,比如调查样本选取的方法和数量问题、比较方法使用时的参数设置问题、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变量控制问题、历史结构主义方法时对各种因素耦合系统的梳理问题等;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方法亟待展开,比如数字人文、指标量表、大样本抽样、大规模数据分析、社会(心理)实验、叙事分析等方法。

在上述4个方面开拓研究的同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语言与国家治理的交叉学科发展方向。首先,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框架,比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但是目前的研究人员大多来自语言学专业,由于语言学学科设置和专业课程的限制,许多学者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框架并非充足或恰当;其次,上述语言学界的弱跨学科性问题,对于专门研究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或社会学学者来说也是存在的,在许多研究国家治理的学者的认知框架中,是没有语言治理这一构件的;最后,交叉学科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设立,或许为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的未来定位提供了一种可能,或者说国家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于学者知识体系和认知框架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就决定了跨学科、交叉学科发展的历史趋势。

《昆明学院学报》首设“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研究专栏,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十分必要,对于开拓研究方向、推动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命题,专栏首期推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专题。3篇文章分别聚焦当前中文国际教育和传播的若干重要议题、国际中文教材的70年发展与未来展望、互动教学模式促进线上国际中文专业课的文化融入,在方法论、数据材料或研究视角上多少或有新意。以此抛砖引玉。

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需立足中国国情、心怀国之大者,亦需放眼全球、交流互鉴,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平衡中提升研究的想象力和创新力。

(责任编辑:杨 恬)